

读书人

挖掘沧州红色历史

孙福军：20年，千万字

齐斐斐

他是一位党龄军龄将近 50 年的老兵，在工作岗位上荣立两次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2005 年退休后，返聘担任沧州军分区军志办主编，一头扎进沧州的军事历史近 20 个年头。在这 20 年里，他完成了沧州市志及全区 16 个县（市、区）的军事志编修，同时，编著了 60 万字的沧州军分区史。今年，为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他用 6 个月的时间编著了 8 部党史学习教育丛书，300 多万字。结合修志，每年都有 30 多篇作品被各级报刊杂志刊发，这些年累计撰写文章稿件 1000 多万字。

2011 年，他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先进军休干部。2013 年被全军评选为军事志工作先进个人。

他，就是孙福军。

打捞历史

退休后再任新“职”

1974 年，18 岁的孙福军应征入伍，从石家庄辛集来到沧州这片红色热土。当接兵人员一到他的家，他就递交了志愿参军申请书并同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并且因在连队干得出色荣立三等功。

2005 年，孙福军退休后闲下来经常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发挥余热，当一名红色宣传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下去。正巧，全军部署编史修志，军分区领导找到他，询问他愿不愿意到分区编修史志，二人一拍即合。

孙福军虽然有在机关长期做文字工作的经历，但修志还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首先是学习新知识，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编史修志的有关论述，学习各级领导的有关讲话精神，学习《军事志编纂工作手册》等政策规定，把上级指示和编纂细则学深悟透，才能把关定向，编出高质量的志书。再就是学习历史知识。这些年因为修志工作的需要，孙福军需反复学习党史军史，因此通读了《资治通鉴》、沧州境内从康乾到民国时期的所有志书。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图书馆、书店、旧书摊是他常去的地方，见到有用可借鉴的书籍，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买回来。

寻访故地

在岁月里印证史实

为了使编写的志书准确全面、不遗漏细节，孙福军一边收集史料、查阅文献，一边实地走访遗址故地，让那些湮没在黄尘古道上的战争碎片，封尘在久远岁月里的军事人物，跃然史册。

黄骅境内有个武帝台遗址，但对于武帝台遗址的形成和来历说不清。为了考证它背后的历史事件，2010 年国庆节期间，孙福军放弃休息，先后三次来到武帝

台遗址。“武帝台在战国时期为军事瞭望台或烽火台。到了汉代，汉武帝东巡渤海之滨时，在原址上筑台观海，所以后来称作武帝台。”登上武帝台的那一刻，孙福军心里有太多感慨，于是，写下了《登临望海有仙居》散文。武帝台这一军事要地，也第一次被记录进了军事志中。

对于志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张照片，他都认真考证，从不敷衍马虎，力图真实可信，经得起历史推敲。南皮有一座西周物尹吉甫的墓，为了弄清墓主人的真实面貌，他专程探访考证、祭奠拜谒，查阅了《辞海》、康熙年间的《南皮县志》等大量资料。尹吉甫是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历经西周厉、宣、幽三朝，是“宣王中兴”时期的重要辅臣。《诗经》记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后人称赞尹吉甫“文以服众，武以威敌，事业文章，炳然千古”。当地人民为纪念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习惯称这座墓为“将军坟”。

张隐韬是沧州早期共产党员，参加过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和正大铁路大罢工、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运动，后来到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家乡组织第一支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为了使张隐韬的事迹更加丰满全面，孙福军到南皮县档案局查阅了张隐韬日记，到郑州烈士纪念馆追寻英雄的事迹，查阅黄埔军校名录和军校将士的事迹，终于全面了解了张隐韬对沧州早期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编写志书，同时写出了“两本发黄的日记见证张隐韬的铁血荣光”长篇纪实文学。

郝克勤是北大印刷厂的一名工人，1920 年加入北京马克思研究会，1921 年入党，沧县人。但沧县党史和沧州市党史对郝克勤都没有记载。孙福军得到北大校园里烈士墓碑上有郝克勤这个名字时，十分激动，第一时间找北京的有关人员协助查找有关资料，并在网上买到北大烈士书籍，为新闻单位提供线索，使郝克勤的资料逐渐完整。



孙福军（中）

三次累病

为修志事业殚精竭虑

由于长时间修志，孙福军的视力大幅下降。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工作日节假日之分，白天和黑夜也变得模糊。2009 年，孙福军妻子住院做手术，他就把军事志带到了病房，在陪护中编修。由于长时间坐办公室，一次他的腰间盘脱出，疼痛难忍。当时孙福军正在为黄骅修志，就买来护腰带，一边辅助治疗，一边修志。

由于特殊原因，沧县军事志一度无人负责，孙福军在沧县县武装部任政委 10 年，他觉得有责任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于是，从谋篇布局到资料搜集，从调查走访到具体撰写，从文字输入到审改校对，甚至是一张照片都亲自去拍摄，节假日、星期天不休息，加班加点工作，3 次累病，只用 9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70 万字的沧县军事志的编纂并出版。

2016 年，孙福军被医生告知心脏主动脉反流超过指数，需要马上做手术。置换心脏瓣膜是个大手术，他在北京阜外医院做完手术后，仅休息了 3 个月，就又投入到史书之中。靠着这种精神，完成了《沧州军事志》的编纂，也曾用 8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60 万字的《沧州军分区军史》，编纂，每年还要为省、市完成当年的年鉴以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并因此获得全军军事志工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在全省，他是唯

一获此殊荣的人。

延伸记忆

四处宣讲红色故事

随着修志工作资料的积累和亲身经历的丰富，孙福军对军史的研究在沧州有了一定影响。机关、学校、社区、企业纷纷找他讲历史、话传统、作报告，对于这些，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欣然答应。

相对和平安宁的生活，一些人淡忘了战争历史，特别是一些青少年。需要把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植入他们的心田，促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此，孙福军把发生在沧州的战役战斗编写成故事，到学校、企业、机关、社区开展红色教育。到现在已经宣讲了数十场次。

在修志过程中，孙福军注意积累资料，开发志鉴衍生产品，增强志鉴存史、资政、教化的附加值。这些年，结合修志，写作出版了《绿色情缘》《踏遍青山》，与他人合作出版了《那時的军营那时的我》等书籍。同时，还写出了《沙场记事》《沧州古今战事》等系列文章。每年结合修志都有 30 多篇作品被各级报刊杂志刊发。

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编史修志成为他追随红色足迹的方式。今后，他将继续用行动传递党的温暖，为鲜红的军旗增光添彩。



为了心心念念的戏曲，在右手残疾的情况下，荆晖以左手“一指禅”的打字方式，写出一部 32 万字的书籍。记录的戏曲故事和人物，时间跨度长达 80 多年，堪称一部自传体的戏曲史纲

《菊坛往事》 一个“戏痴”的爱与思

杨金丽

左手“一指禅” 写出洋洋 32 万字

在运河区广电小区，退休干部荆晖一拿出刚刚出版、还散发着墨香的《菊坛往事》，记者就被这本书独特的设计吸引了：素雅的封面上，不同的兰花指构成菊花状，寓意戏曲既贴切又深远。书名旁，署着他的名字。

熟悉荆晖的人都知道，2012 年在台湾遭遇车祸后，他右臂摔断，右手再也不能写字。那部长达 32 万字的书籍，是怎样完成的？

78 岁白发苍苍的荆晖笑着说：“右手写不了字，还有左手！”身体稍稍恢复，他就开始练习左手写字，几个月后，字渐渐好看了。接着，他又练习左手拼音打字，被孩子们称为“一指禅”。

荆晖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唱京剧，二是写文章。早在 2001 年，他就出版了《艺苑嘉卉》一书，获省戏剧百花奖·优秀戏剧理论奖。后来又出版《梨园春秋》，参与编纂《燕赵梨园百家》。晚年再写《菊坛往事》，尽管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整本书充盈着一个“戏痴”对戏曲的热爱、追慕与思考。

为了这部书，他还差点儿丢了命。今年 3 月，校对书稿时，他一下子昏迷过去。幸亏抢救及时，心脏手术后，才抢回一条命。家人埋怨他：“为了书，为了戏，你连命都不顾吗？”他笑答：“任务没完成，我走不了！”

《菊坛往事》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拿到书的那一刻，荆晖百感交集。

不到园林 怎知春色如许？

书中开篇，引用了昆曲《牡丹亭》杜丽娘那句脍炙人口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来形容戏曲对自己的吸引。荆晖说，每次听到《牡丹亭》，他心里总是五味杂陈：人人心中都有一片园林，他的那座园林就是戏曲。他几乎用一生的长度，才慢慢领略了那些“良辰美景”，在戏曲艺术的殿堂上，获得了精神层面的独特滋养。

荆晖的爱戏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3 岁时，老家河间太平庄建起了“醒众剧团”，能演剧目 50 多出。只要有演出，他就去看。冬天看戏看到半夜，小脚丫冻成“冰凌坨”，回家钻二爷的被窝，二爷给他放在

胸口上捂。后来大了，大哥带他去邻村看戏，那么冷的天，他们吃着大火烧卷肉，看演员光着一条膀子，手挥狼牙棒在戏台上舞来舞去……那一幕幕看戏的趣事，至今难忘。

再后来，他成了《沧州日报》记者，采访过不少戏曲名家；1983 年在肃宁任职，在这片号称“戏窝子”的地方，他彻底和戏曲尤其是京剧发生了“化学反应”。1989 年，他调任沧州地区文化局工作，按照他的同乡、著名作家闻章的话说，这是涸泽之鱼归于大海。接触到数以百计的戏曲名家，并和他们交朋友，从此“公事当成私事来做，身心完全融入，乐此不疲，由此领略到无限的乐趣，甚至是妙趣。”

结识著名京剧名家孙毓敏，并成为相交 30 多年的老友，也在这一时期。孙毓敏听说荆晖写出《菊坛往事》一书后，欣然写序，并说：“第一次与荆晖邂逅，我们就很投缘，互相留下了美好印象，从此交往不断。他酷爱京剧，业余时间，跟随我的磁带学戏，由于懂得戏情戏理，学戏很快。我把出版的十几盘磁带都送给了他，他终于练就荀派男旦……”

在孙毓敏心目中，荆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票友，还是个颇具才华

的理论家、具有组织才能的票社负责人、肯为弘扬戏曲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热心人。他为戏曲倾尽心力的故事，为全国戏曲界所熟悉，并荣膺“推动京昆突出贡献奖”。晚年，他最大的希望是：把生平爱戏的故事告诉更多人，为大家打开一片戏曲的园林。

自传体形式

记录 80 年沧州戏曲史

这本书荆晖以自传体的形式，从个人亲历的角度，记录了他同梨园诸位名家的艺术交往，也记录了沧州 80 多年的戏曲大事。书中收录了他和不同时代戏曲名家的合影，多达 450 多幅，几乎囊括了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名家名伶。

荆晖不仅听戏、学戏、唱戏，而且写戏。他先后拜访过百余位戏曲名家，写了不少文章。《菊坛往事》一书，既集纳了这些文章，同时也是再创作。书中首篇文章，名为《火线剧社的激情岁月》，是他采访当年火线剧社队长王德厚老人的故事。文章中，既有他赴京采访的过程，也有王德厚回忆火线剧社排演节目、为抗战军民演出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把人拉到了 80 多年前的战争岁

月。这一时期，沧州还一度出现过冀中实验剧院，演员们还曾赴西柏坡为毛主席演过戏。这段有关戏曲的红色故事，也成为沧州戏曲的一大亮色。

荆晖生于 1943 年，把自己与戏一生的故事联袂成篇，就是一部生动的沧州戏曲史。《偏僻村落戏韵浓》以自己亲历的家乡太平庄“醒众剧团”的故事，勾勒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沧州农村戏曲的兴盛情景。1968 年，他从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当时正值“样板戏”年代，那时，可谓天天在听、人人会唱，他用诙谐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时期的戏曲故事。改革开放后，戏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他尽情地记录这一阶段的沧州戏曲盛事：沧州成为“京剧之乡”、各种新编剧目不断涌现、本土演员不断成长……

书中记述最多的，还是他与戏曲名家们的交往。梅葆玖、尚长荣、刘长瑜、谭元寿、杜近芳、李维康、张火丁……这些辉映了不同时代的京剧名家们，以不同的风姿出现在《菊坛往事》中。荆晖不仅记述他们的艺术，还记述他与他们的交往，戏曲演员这个独特群体的艺术人生，在书中得以鲜活生动地体现。

我家家风漫书香

南天

我母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老姥爷，叫谷元玉。抗战时期是一名八路军、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动乱、最屈辱的时期。

因深入敌后，不能让日军、伪军知道姓名，他便将姓改为母姓，姓姜。新中国成立后又把姓改了回去。

众所周知，那时候日本人把中国人当活靶子，捆住上身练刺刀。我老姥爷命大，被抓去来来回回好几次也没死，但身上伤口众多，特别是腿上伤痕累累。

新中国成立后，老姥爷复员回家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正是中国最困难的那几年。那时候人人都吃不饱，他守着村里的两筐花生，竟把自己饿昏过去！

母亲说，那时候老人在家里贴着四个字“实事求是”，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母亲读。我家的家风正是“实事求是”。他在军中管后勤，做得十分到位。担任村支事后，发挥了治理才能，让这个小村子成为周围最富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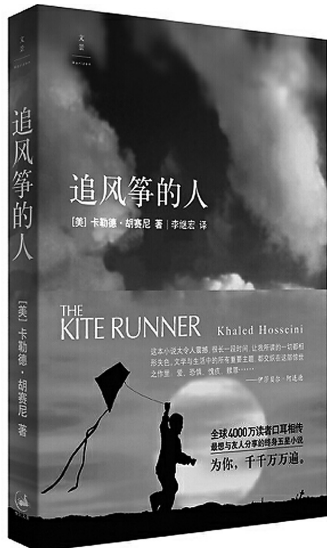
我家是个书香门第，从老到少无一人不爱读书，“勤奋读书”的家训就是从我老姥爷那里传下来的。为什么让他管后勤？因为他识字啊，是那时候泊头师范的高材生。

我的母亲可以说是老姥爷的传承者，她没有进过大学校门，却利用 10 年的时间自学成才，先后拿下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书。后又考入南皮县税务局，并获市级作协会员、沧州市青年作家协会理事，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各类作品 100 万字，被《半月谈》《意林》等 50 多家媒体刊用。

父亲从事文字工作 30 年，一直兼职、专职从事公文、新闻的创作，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作为国家、省、市几十家媒体的特约记者、通讯员，在全国上百家新闻媒体累计发稿突破万余篇，2000 多万字，作品屡获国家、省、市新闻奖。

我家现在依然书香满园，藏书千余册，还被评为沧州市最美（书香）家庭、河北省最美家庭等。

推荐书目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12 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告别 20 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袭来，阿米尔该如何抉择？

戏曲书韵